

茂陵博物馆藏西汉铜染器赏析

魏乾清



图1



图2



图3

汉代铜染器，其形制起源可追溯至商周时期的青铜温鼎，是汉代流行的组合型食器，主要用于温热肉羹或加热酱料，也可视为一种自带加热功能的蘸料碟。目前，从出土的汉代铜染器形式来看，通常为椭圆形，造型美观大方，线条简洁流畅，底座可见镂空的花纹。一套完整的铜染器由耳杯、炉体、托盘组合而成。炉上之耳杯名为染杯，用以放置蘸酱，以供染食；炉体名为染炉，用以存放炭火，以加热染杯中的蘸酱；染炉下有一浅口托盘，用以承接染炉之中的炭灰等杂物。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都邑郡县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表明汉代官吏、商贾乃至平民，都崇尚使用耳杯进食的风气。《陶斋吉金录》中所记：“制作精工之染器，除杯、炉外，尚附承盘。”青铜染器在汉代上层贵族阶级中十分流行，不仅展示了汉代贵族在饮食方面的讲究和精致，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繁荣和文化的丰富。

茂陵博物馆收藏有三件西汉铜染器，一件是茂陵保护区内的陈阡村采集，另外二件是茂陵陪葬墓从葬坑出土。它们均来源于茂陵陵区，形制相似，图案有别，保存完好。铜染器的出现和使用，为研究汉代的日常生活、饮食习惯、等级制度和审美观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四神纹铜染器(图1)

1961年陕西西平南位镇陈阡村采集，通高11厘米，通长24厘米，耳杯口径长12.3厘米，宽7.6厘米。

四神纹铜染器(图2)

1981年5月，陕西西平西吴镇樊家村北汉武帝茂陵1号陪葬墓1号从葬坑出土，通高10.3厘米，耳杯口径长13.8厘米，宽8.8厘米。

该“阳信家”铜染器由一炉一耳杯组成。炉椭圆形，敞口，直壁，平底，下设三蹄足，炉腹向外平伸一个长柄，柄端作桃形，炉底有承灰盘。炉壁镂三角形孔，底镂两排条形孔。炉的口沿有四个方形支钉。炉身、承盘、三足、手柄分别锻制后焊接成整体。炉上承托铜耳杯，杯底刻铭文二十二字：“阳信家铜杯，容二升，重十五两，三年曹孟所买，第五，函池。”炉壁口沿外侧刻铭文二十字：“阳信家铜炉，重二斤十两，三年曹孟所买，第六，函池。”

“阳信家”铜染器(图3)

1981年5月，陕西西平西吴镇樊家村北汉武帝茂陵1号陪葬墓1号从葬坑出土，通高10厘米，耳杯口径长13.8厘米，宽8.8厘米。

该“阳信家”铜染器由一炉一耳杯组成。炉上承托铜耳杯，杯腹外刻铭文十六字：“阳信家，容一升半升，重十五

两，第九，函池。”壁口沿外刻铭文二十字：“阳信家，重二斤十两，第十，函池。”

图2、图3两件铜染器同一时间出土于同一从葬坑，形制相同，铭文有别，但均有“阳信家”铭文。根据文献资料和茂陵考古勘探资料，结合器物造型特征分析，可以确定“阳信家”即阳信公主之家。阳信公主系汉高祖之孙女，汉景帝与王皇后之女，汉武帝刘彻之姊，平阳侯曹寿之妻。曹寿为侯二十三年，于元光四年(前131年)死，不久公主自缢于大司马大将军长平侯卫青；铜器铭文所记“三年”，应是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由于“建元”年号系以后追补，故当时没有刻上；关于“函池”，史无记载，根据同出的阳信家铜鼎所记“黄山”推测，“函池”也可能是“函池宫”。这两件铜染器刻了器物的所有者、购买者、购买时间、重量及容量等，为研究西汉的铜铁冶炼业、度量衡制度、器物定名、判断1号坑的时代及1号无名家的墓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西汉时期，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铜器制作工艺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铜染器便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它的造型设计充满了创意和想象力，既考虑了加热温食的时效性与实用性，又对炭火燃烧后的炭灰收集、清洁问题进行了设置，使其功能兼具，安全环保。其别致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赢得了人们的喜爱，让人在使用过程中感受到愉悦和舒适，体现了当时工匠的高超技艺和审美追求。

茂陵博物馆藏的两件西汉铜染器，不仅具有实用价值，富有艺术美感，更是一部生活写实的历史书。它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了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显示出我国浓郁的饮食风俗文化，成为汉代人们席地而坐、分餐而食这一生活方式的直接见证者，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海岱吉金

——《山东馆藏精品文物大系·青铜器卷》中的商代青铜器铭文探微

徐倩倩



图1 大辛庄(刻)鼎(大辛庄M225-7)铭文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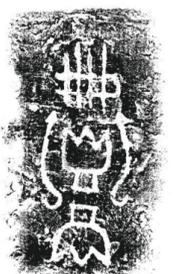


图2 苏埠屯扁方鼎铭文拓片



图4 晚商戎兽面纹两垂耳铜簋底部铭文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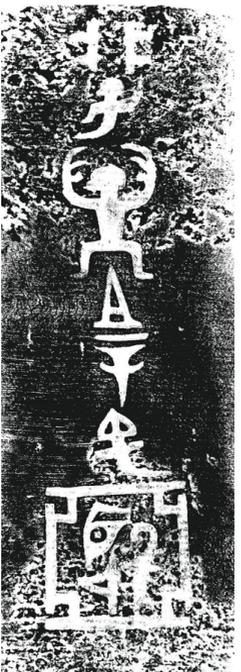


图3 晚商鼎铭文拓片

山东地区商代遗址众多，遗存丰富，有济南大辛庄、滕州前掌大、青州苏埠屯等重要的遗址或墓葬，一些地点发现高等级的墓葬，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遗物。

这些遗址中出土青铜器较多，其中有近400件铜器上带有铭文，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发现铭文铜器的有20多个地点，重要的土地地点有：济南大辛庄、青州苏埠屯、寿光益都侯城、邹城南关、济南刘家庄、滕州前掌大等，重要的铭文有大辛庄的“索”(图1)，青州苏埠屯的“亚醜”“融”(图2)，寿光益都侯城的“己”“毓”，滕州前掌大等地点出土的“史”，长清小屯、费县朱田等地点出土的“举”(图3)，长清小屯、济南刘家庄的“戈”，济南大辛庄、邹城南关等地点的“子”，济南刘家庄的“彘”，兰陵东高尧的“癸”(图4)等。另外在胶州西庵、惠民兰家、章丘东河溪、滕州种寨、平邑洼子地等都出土多种铭文或符号。上述重点地点的铭文青铜器在《山东馆藏精品文物大系·青铜器卷》中都有收录(图5)，同一地点、同组的器物，保存状况良好的器物基本均收录，基本上每一件器物的器型、铭文照片和拓片均有收录，绝大部分进行了释读，是研究这些器物的重要资料(图6)。

铭文大多字数不多，1字的最多，1字的一般多为标志族徽，例如举、戈；有一些符号，可能也有特殊的含义，比如前掌大的“鸟”，沂水戈上的“鸟”等，个别铭文或符号目前不能辨识，例如邹城西丁村的“”，字数较多的铭文铜器较少，2、3字的一般是带有日名，为祭祀类铭文，表明器物为谁而作，目前所见的是为“父”作，例如桓台史家遗址的“父癸”觚。少见为母而作的，例如泗水张庄的“史母癸”觚，族徽有时在前，例如滕州前掌大的“戈父乙”觚；有时族徽在后，例如淄川区的“父辛鱼”觚。有少量多字铭文的铜器，铭文为叙事，如桓台史家且戊觚，圈足内有铭文：“戊寅舞作祖戊舞”。道光年间寿张县梁山出土的“小臣隸”尊。

带有铭文的器型也比较集中，容器主要是鼎、鬲、罍、尊、簋、缶、觚、爵、角，武器有钺、戈、矛等，少见罍，其中又以觚、爵数量最多。铭文在器物的位置相对比较固定，例如鼎、鬲、罍一般在器物口沿下的内壁，尊、罍、缶、觚多位于器内底，觚多在圈足的内壁，爵、角或者罍等带鬲的器物，多位于鬲内。有盖的器物如果有铭文的话一般在盖内有对铭。钺、矛的铭文在器身，戈在内上。

从出土铭文的情况看，山东地区一些商代遗址和墓葬地位较为重要，能够成为方国级别的有青州苏埠屯、滕州前掌大、寿光益都侯城等。很多地点从地理位置、铭文情况反映商王室东征的据点，如长清小屯、济南大辛庄、济南刘家庄、惠民大郭、滨州兰家、桓台史家、坊子院上、费县朱田等。有些地点或与殷遗民相关，如兖州、邹城一带、兰陵东高尧、新泰府前街、胶州西庵等，出土较多商末青铜器(个别地点与西周早期青铜器共存)。众多铭文青铜器的出土，反映了商王室派出多支系、大量贵族东征东夷，也逐渐成为东土的重要成员，也是周代东方主要对峙力量的根源。

除了出土器物以外，在山东一些博物馆中保存相当数量的商代青铜器的传世品，为研究商代青铜器提供更丰富的资料，《山东馆藏精品文物大系·青铜器卷》中也有收录。例如现收藏于山东博物馆的射妇桑铜簋，原为山东黄县丁干圃旧藏，长方体，带双附耳，器身满饰纹饰，腹内壁铸有“射妇桑”。此件器物不仅形制奇特，制作精致，铭文也少见。又如济南市博物馆的亚醜尊(图7)，青州苏埠屯出土，是在废旧物资仓库中拣选而出，通高达42厘米，为带盖的圆尊，器盖和口内均有“亚醜”铭文，器型厚重，器身满饰纹饰，繁缛而精细。此两件器物均为商代晚期青铜器的重器，甚至填补了出土青铜器的空白，丰富了商代晚期青铜器的研究资料，也为商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图6-4 盃盖面纹饰拓片



图6-1 山东博物馆“作珙从彝”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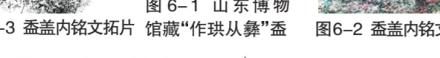


图6-2 盃盖内铭文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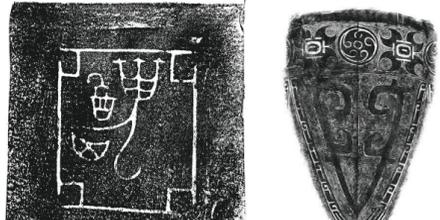


图7-2 盃口沿内壁拓片



图7-4 盃下腹部纹饰拓片



图7-1 济南市博物馆藏亚醜尊



图7-3 盃肩部纹饰拓片

(上接5版)

成才

“愿得此身长报国”“留取丹心照汗青”是流淌在中华儿女血液中的基因，“壮志凌云志在四方”“金榜名传四海知”是镌刻在成长轨迹上的青云壮志。成才是对孝行更高层次的彰显，成才者是其父母长辈养育有方，其成就是“慈孝”的传承与弘扬结果。

画绣虎镇五毒纹童袄(图5)

民国



图5



黑缎地平绣书法“春风”“金榜”诗文眼镜盒(图6)

清代

眼镜盒以黑缎为地，采用平绣技法以金线绣出“春风及第，一色杏花红十里；金榜题名，状元归家马如飞”的行楷诗文，笔力遒劲，沉稳雄健。用金线绣出锯齿状绣边用以装饰、固定，配饰采用蓝色斜编式提绳，提绳结实耐用且耐穿。整器既美观又牢固，风格稳重且不失风雅，象征佩戴者成家立业的美满人生和家庭诉求。

木质父子司马匾(图7)

清代

上款：咸丰五年鸿岁乙卯冬月穀旦
下款：叶廷锦 男馨 立
司马，古代职官名称，殷商时代始置，位次三公，与六卿相当，与司徒、司空、司士、司寇并称五官，掌军政和军赋；春秋、战国沿置；汉武帝时置大司马，作为大将军的加号，后亦加于骠骑将军；汉后单独设置，皆开府；隋唐以后，为兵部尚书的别称。司马父子，亦寓指司马迁父子修《史记》的故事。“父子司马”旨在颂扬受匾人父子相知，子承父业，赞誉其家族后继有人，荣耀显贵。

图6



图7

传承

“山而川，生生不已。”古人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于个人、家族、行业，乃至国家。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妻贤，长幼有序，尊师重友，爱国守则，皆为孝的传承。家谱、家风、家训是传承过程中的重要载体。由小及大，走出一家之门，到一行之当，一国之土，孝的传承在国家情怀中践行。

木质萱草长

春匾(图8)

清代

上款：赐进士出身 钦点翰林院编修充 国史馆纂修 文渊阁校理 河南道监察御史 现掌福建道监察御史 丁酉科顺天乡试同考官加五级 金光杰
下款：彭虎饶老孀人太学生玫瑰之母 八旬荣寿立 道光十九年岁次己亥孟冬月 穀旦
《诗·卫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唐代陆德明释文：“谖，本又作萱。”萱草，一种草本植物。古制，北堂为士妇之居，故称一家之主母的居室为萱堂，萱又逐渐称为母亲的代指。《红楼梦》：“北堂有萱兮，何以忘忧？”此是祝福母亲高寿的祝寿匾，恭颂受匾人如萱草长青，幸福长寿，无忧无虑。

中堂复原场景(图9)

中堂，在中国传统家居布局中地位至高无上，是礼仪、议事、会客的重要场所，更是家族对子孙进行人生立志教育和伦理道德感化培育的中心。以中堂的中轴线为准，匾额、书画、楹联、家具成套摆放，对称布局，凸显恭敬有序、严谨规范的中堂形制结构。中国人以“典雅庄重，秩序井然”的建设和陈列布局传承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价值观。中堂以端正平稳的秩序氛围，表现出中正和谐的哲学思想，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家庭精神境界与生活品味的关键空间。

枝繁叶茂五千年，血肉亲情连不断。孝文化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礼俗文化的基础和核心，是中华文明思考个体与家庭关系的思想结果，千百年来一直作为伦理道德之本而备受人们推崇和礼赞，具有深邃的历史价值和广泛的认同性。

2025年适逢“十四五”收官之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的重要节点。北京民俗博物馆策划推出中华传统美德系列展之“崇孝至善——北京民俗博物馆孝文化主题展”，旨在全面发挥博物馆在推进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建设中的阵地作用，用文物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希冀观展公众更好认识、了解、感悟中华传统美德，深入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和思想肌理，生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为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贡献力量。



图9



图5

